

投稿類別：史地類

篇名：女足何屬？論日治時期解纏足運動

作者：

郭語欣 市立秀峰高中 二年級 04 班

詹家瑜 市立秀峰高中 二年級 04 班

蔡姍霈 市立秀峰高中 二年級 04 班

指導老師：

陳志銘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日治時期總督府視台灣鴉片、辮髮、纏足為三大陋習，是阻礙文明開化邁向現代社會的絆腳石，因此總督府試圖改變，但推動過程中，有許多考量因素，並非一蹴而成，其中對於纏足的解放引起我們的興趣。一方面組員都是女性，想了解長久以來禁錮女性的纏足枷鎖如何解開；另一方面處理纏足問題意義不同於鴉片與辮髮，鴉片涉及殖民母國經濟利益，關係總督府的財政穩定與否；而辮髮涉及國家認同問題，具有濃厚政治意涵；至於纏足則是中國父權思想下的產物，與女子個體有關，革除與否顯得不是那麼迫切。

因此我們將透過本論文的探討，了解以下幾個問題，包括台灣歷經多次政權的轉換，纏足習慣是在什麼時候產生？而台灣分布多元族群，如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等，纏足是普遍存在每個族群嗎，抑或部分族群？總督府對於纏足的想法與後續的對策為何，民間的反應與官方一致嗎？日治時期女性本身對於纏足的態度又是如何？

二、研究目的

- （一）了解纏足在台灣之源流與發展
- （二）探討日治時期解放纏足的過程
- （三）分析解放纏足的文化意義與國家統治關係

貳、文獻探討

一、台灣纏足的由來

台灣過去主要的族群是原住民，原住民傳統上沒有纏足習慣，因此台灣纏足的形成是隨著漢人開始大量移入台灣之後，中國纏足文化也隨之傳入。

中國纏足風氣的起源根據清朝歷史學家趙翼的考證，認為應該開始於十世紀左右，也就是大約五代時期，隨著時間發展，風氣漸漸興盛。在地域上，是從北方傳入南方、城市蔓延鄉村；在階層上，是從上層社會擴散到一般百姓。到了十八世紀時廣為流行，家家戶戶的婦女不論其身分是貴或賤都纏足（高彥頤，2022）。

漢人移民台灣有幾波熱潮，先是鄭氏政權來台，後有清朝官員沈葆楨奏請廢除渡臺禁令後。隨著台灣從拓墾社會朝向定居社會發展，台灣社會文化與中國大陸日漸相似，

纏足習慣也落地生根。

二、台灣纏足族群的分布

漢人移民來台的族群主要是以閩南人和客家人為主，然而兩個族群女性纏足的狀況又有差異。根據日治時期 1905 年的戶口統計資料，台灣纏足女性為 800,616 左右，占台灣女性總人口的 56.94%，而纏足女性中多為閩南人，如下表所示：

表一：各族群女性纏足狀況

女性 總人口數	1,406,224	各族群 實際纏足人數	漢人	福建	797,347
				廣東	2,881
				其他	36
			熟蕃		127
			生蕃		1
			清國人		224

表一資料來源：改編自洪郁如（2022）

為何台灣客家女性不願意纏足呢？人們對客家人傳統的印象是勤勞、儉樸，回溯中國過去纏足歷史發展，客家女性纏足比例向來偏低，綜合不同學者的見解，原因可能包括：

（一）客家女性必須勞動無法纏足：客家人生活以山區丘陵地為主，自然資源相當有限，為了維持家計生活必須投入大量勞力，如果家庭女性再纏足，既不便行走於崎嶇道路，也失去工作能力。

（二）受到邊區少數民族文化影響：客家人遷徙的地方，當地大多已有土著生活，彼此文化交流、通婚互動，少數民族沒有纏足習慣，也使他們沒有纏足必要。

以台灣當時環境來說，移民來台客家女性主要是受原鄉生活影響，以及為了協助拓墾開發，自然選擇不纏足（簡鑫如、謝穎慧，2023）。

三、日治初期官方與民間對於纏足的看法

中國禁止纏足活動是在 1898 年光緒皇帝實施戊戌變法時，康有為曾有過建議，但維新變法百日即夭折，之後慈禧太后下懿旨勸禁纏足，不過成效有限。清朝滅亡民國成立後孫中山亦頒禁令，縱使中國脫離皇權專制體制，纏足之風依然普遍。台灣自 1895 年清朝簽訂《馬關條約》割讓日本後，與中國關係漸行漸遠，受中國戒足活動的影響不大，因此台灣解放纏足運動必須從日本殖民統治者及島內民眾的想法來討論：

（一）官方視角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強調現代化的發展，因此殖民台灣時，面對傳統落後舊慣，自覺肩負文明教化重任。纏足既損害母體，亦不衛生美觀，也減損勞力來源，何況台灣作為日本子民，怎可留下中國人身符號，因此總督府認為根除纏足陋習有其必要。

然而日治初期，抗日事件頻傳，總督府備感壓力，改革纏足舊俗並非優先處理順位，因此以寬容或放任政策為主，以免造成新一波的衝突。直到總督府穩定統治基礎後，國家力量足以控制民間基層，才較積極處理纏足問題。1915年，《保甲規約》中明訂：「**婦女纏足有害身心，故嚴禁之。**」官方展開大規模的解放纏足活動（命運轉折：中央研究院一流轉年華臺灣女性檔案百年特展，2011）。

對總督府而言，解決纏足陋習，一方面可以呈現殖民地文明開化的成功；另一方面也可降低閒置人口數量，有助經濟發展。

（二）民間視角

台灣島內民眾對於纏足的反思是從男性本土菁英中展開，如解放纏足先鋒大稻埕地方領袖，同時具漢醫身分的黃玉階，在1900年成立台北天然足會，以廢除纏足惡習，指導移風易俗為目標。台北天然足會的成員以地方仕紳與商人為主，其成立旨趣即強烈抨擊纏足陋慣，如「**最可怪者，支那女人之纏足**」、「**痛殺千百萬之女**」、「**與天地之心相違，流於惡毒殘忍而不悟**」、「**為夫育子，種種要務，纏小其足，步履艱難**」（黃玉階，1900）。

其實，男性本土菁英的覺醒亦有官方力量的引導，例如透過報章雜誌，讓他們了解纏足有害女性身心，抑或不時報導維新志士在中國倡導不纏足會的消息，總督府也邀請他們赴日參訪，體驗日本開化的文明，台北天然足會參與人李春生即是一例（游鑑明，2022）。

綜而言之，日治初期不論官方或民間對於改革纏足陋習的看法是一致的，但當時官方為了消弭反日勢力與籠絡台民，推動力量相當有限，轉而鼓勵協助男性本土菁英進行移風易俗的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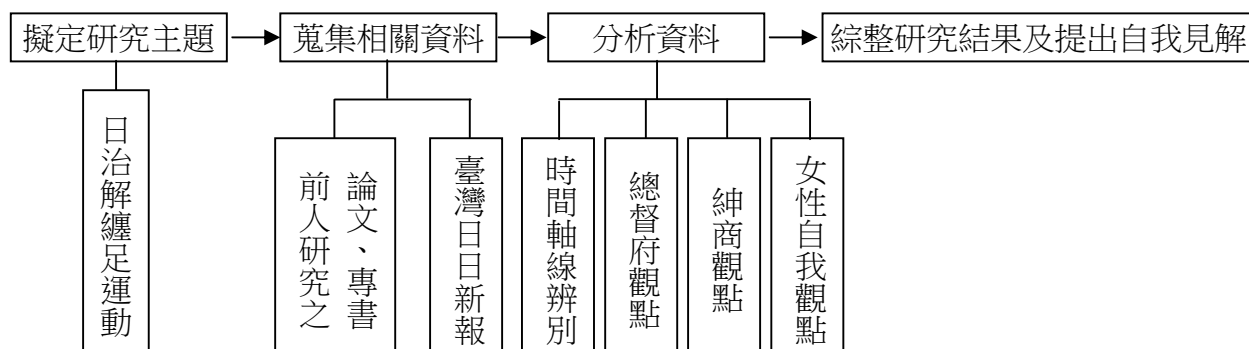
參、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我們主要透過文獻分析法來研究，除了廣泛蒐集有關日治時期解纏足的研究外，亦透過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電子資料庫中所典藏的「臺灣日日新報暨漢文日日新報整合平台」（http://ddnews.nlpi.edu.tw/login_rrxin.htm），搜尋其中對於纏足、解纏足的相關報導。

二、研究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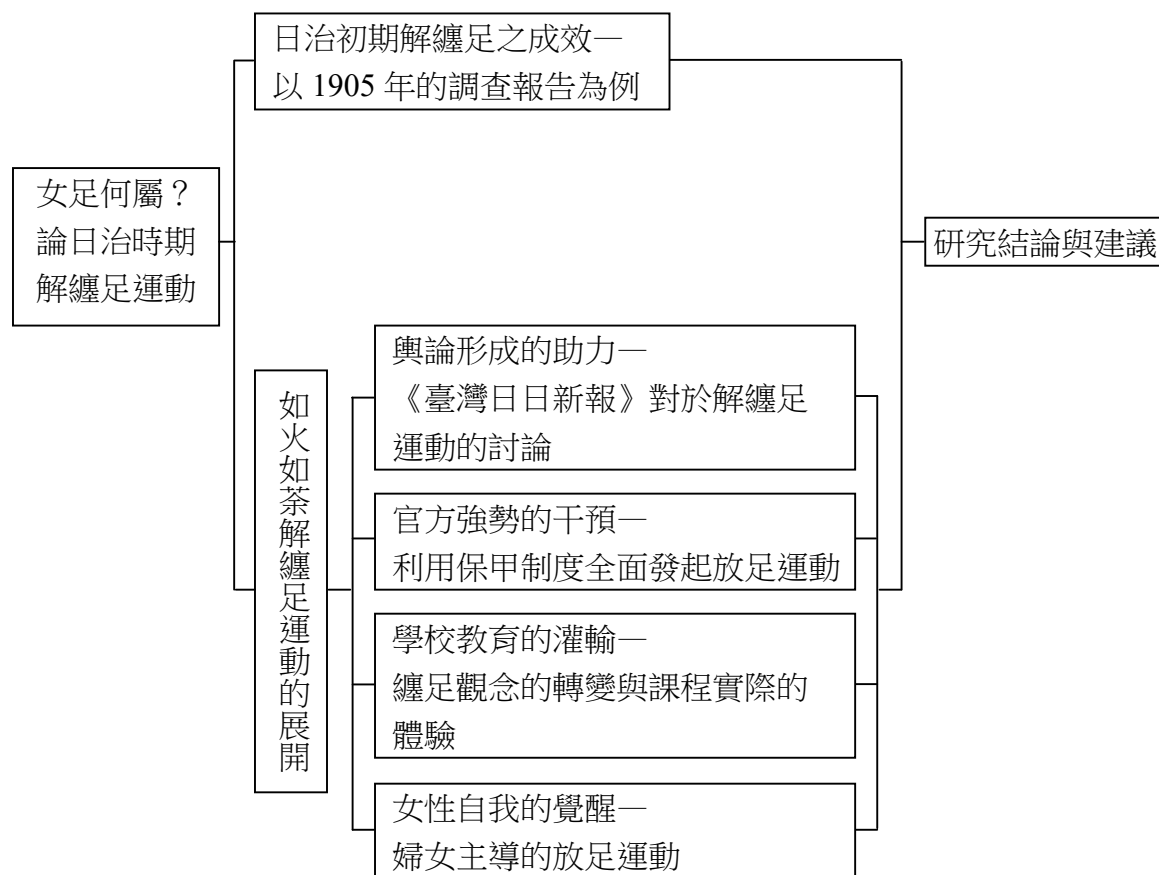
圖一：研究流程圖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三、研究架構

圖二：研究架構圖



圖二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日治初期解纏足之成效—以 1905 年的調查報告為例

台北天然足會成立後，透過文字報導及具體講演活動來宣傳解纏足，如發行《天然足會會報》月刊，說明會員放足狀況，書寫勸導解纏或戒纏詩文，抑或開設講堂教化，其他各地亦有呼應者，也相繼成立解纏足會，如台南、基隆等地。然而，這段時期放足活動未達預期效果，我們可從 1905 年官方調查結果明確得知，如下表所示，以實際行動解纏足的台灣婦女，僅 8,000 餘人，也就是大約 1% 的纏足人口，其中年紀大多是在 15 歲以下，約占 3%。

表二：1905 年台灣婦女纏足 / 解纏足情形

年齡群	纏足人數	解纏人數	曾纏人數 (=纏足+解纏)	解纏比 (=解纏 / 曾纏)(%)
10 歲以下	53,163	1,630	54,793	2.97
10~15 歲	74,940	2,025	76,965	2.63
16~41 歲	672,513	5,039	677,552	0.74
總計	800,616	8,694	809,310	1.07

表二資料來源：改編自苗延威（2013）

1908 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一篇社評曾批評天然足會「名目僅存，卒無成效」，認為「非官協力贊襄，不易為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12.17）。

日治初期反纏足的活動實際效果有限是可理解的。一來纏足風俗由來已久，短時間內自然難以改變；再者推動者主要是部分本土菁英，未受開化文明的體驗或新式教育的薰陶的中上階層及一般人家，對於解纏足活動興趣缺缺，何況纏足與否也象徵階級地位差異。最為重要的是纏足的本體——女人，她不見得願意解纏，因為對於未纏足的女性來說，纏足可為其未來婚嫁占得優勢，而對於已纏足的女性來說，解纏後憂心雙腳能否適應生活。

綜上所論，改革纏足運動須有更多人的參與，特別是女性的自覺，官方主導力量也不可或缺，同時也須運用有效資源和方式，如學校教育灌輸、保甲組織協力，才能真正根除纏足陋習。

二、如火如荼解纏足運動的展開

（一）輿論形成的助力—《臺灣日日新報》對於解纏足運動的討論

1914 年底《臺灣日日新報》舉辦徵文比賽，主題為「論纏足之弊害及其救濟策」，引來新、舊知識分子踴躍的參與（此處新知識分子指的是受新式教育者，如國語學校、醫學校；舊知識分子指的是受舊學、擁有科舉功名身分者），亦包括女性。《臺灣日日新報》所刊載的文章除了指出纏足缺點和分析放足運動成效不彰原因之外，也提出相關解決辦法，有助於日後官方及民間推展解纏足運動參考依據，如：

- 1.以公權力介入，「政府當令各區役場，設立勸誘改纏會」，「政府於保甲條約內，或違警罪例內，附加處罰纏足之條」（臺灣日日新報，1915.4.12）；「有行政權者，出解纏令，立取締法，如阿片之厲行」（臺灣日日新報，1915.4.14）。
- 2.透過學校教育宣導，「女子時使知解纏之義，講解纏後弱體之弊，改造強健身體」（臺灣日日新報，1915.4.16）。
- 3.由各地婦女領袖組織解纏會，在城鄉普遍設置分會、支會，派遣專人宣講和鼓勵放足（臺灣日日新報，1915.1.1）。

（二）官方強勢的干預—利用保甲制度全面發起放足運動

總督府延續清朝保甲制度並予改造，使保甲組織成為地方行政一環，亦可進行社會控制，因保、甲民負有連坐責任，對連坐者，可處罰金或科料。透過保甲強制執行放足舉措，成效較佳，如 1912 年 1 月 18 日宜蘭解纏活動為例：透過保甲系統，由保正、醫護人員沿街逐戶確認纏足狀況，預計至少在一兩週內完成解纏行動，如果是纏足不久的人，立即放足；若是纏足有段時間的人，給予一定放足期限，經過此一強力約束，「近日間解纏者，十有八九之數」（臺灣日日新報，1912.1.18）。

1915 年，日本利用治台「始政二十周年紀念」，4 月由民政長官對各廳長發出通牒，將禁止纏足及解纏事宜附加於保甲規約中，並對拒絕放足者處以罰鍰。自此，正式利用保甲制度全面發起解纏足運動，以期邁向文明國家（游鑑明，2022）。根據 1915 年戶口調查顯示，當時全島熱烈響應，以台中廳為例，原本纏足人數為 133,689 人，經此運動後解纏人數有 113,194 人，高達八成五左右（苗延威，2013）。而未放足的人多半受限舊有習慣，或因蹣跚已經變形以致無法放足。此時，解纏足運動已為社會多數人認可，同時又有國家強制力量介入，自然水到渠成，而尚未纏足的年輕女性也在社會制約下不再纏足。

（三）學校教育的灌輸—纏足觀念的轉變與課程實際的體驗

傳統漢人視「女子無才便是德」，即使女性能受教育，內容也以學習三從四德觀念為主。日治時期，總督府正式將女子教育納入學制，招收臺人女子進入公學校接受基礎教育。1902 年公學校教科書第九冊中的〈纏足〉一課，明確指出纏足對女性的迫害，包括

不良於行、不易工作，同時表示近來女童願意放足是好現象（金湘斌，2011）。1913 年《公學校用國民讀本》卷八編有〈阿片と纏足〉一課，也認為吸食鴉片及纏足兩者是台灣社會最大陋習，所幸近來維持這陋習的人漸趨減少（林淑慧，2004）。

透過學校教育灌輸放足觀念有其必要性，根據 1905 年官方訪問 8~25 歲女學生的資料顯示，她們對於為何纏足的觀點，主要是從「美觀」角度來談，這也呼應長期以來小腳是評價女性的標準，如俗話所說「看腳不看面」（洪郁如，2022）。但隨著教育不斷推展，透過課堂反覆講述，使原本是美的價值，轉變成是惡的陋習，也藉由體育課程的體驗，實際感覺纏足的不便。如 1915 年時人評論說纏足救濟根本在於鼓勵女子教育，使其自我發現纏足的弊害，現今學校女學生纏足的人不多，「察其根源，由教育之功大也」（臺灣日日新報，1915.1.1）。

（四）女性自我的覺醒—婦女主導的放足運動

解纏足運動的真正主角是女性，但她們在傳統中國文化中是無聲的一群人，日治初期解纏足運動的核心仍以男性為主。1911 年開始有了改變，如 5 月「台北解纏會」成立，正、副會長皆為女性，分別是陳宇卿（參事洪以南之妻）、施招（艋舺區長黃應麟之妻），由於纏足本體是女人，唯有女人最為了解，因此在會則中規定女性擔任正、副會長。（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8.10）8 月，根據台北解纏會的報告，三個月內會員人數已達 1,061 人，天然足與已解纏的人計 631 名，當中包括原本纏足而後放足的人有 431 人，響應可謂熱烈。1914 年以後，彰化、台中、宜蘭等地也有女性名流或領導放足運動。由女性自組團體，推動放足運動，相對過去由男性領導鼓吹解纏，無疑是一大進步。

雖說當時領導解纏的女性仍以紳商之妻為主，不論她們是否出自自覺，抑或是因丈夫身分配合總督府政策，至少使整個解纏足運動轉為以女性為主體，參與人數不僅增加，且更積極。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婦女自主的解放

解纏足運動最重要的文化意義之一即是解放婦女。纏足文化流行千年之久，為了符合男性期待及女性身分、美麗象徵，卻禁錮女性終身自由。隨著日本治台，文明思潮抵達，總督府視其為三大陋習之一，試圖改革。雖說初期官方受限治安紛擾，為了避免造成再次衝突，因此以勸導或透過紳商來推動，礙於舊習難改，以致成效不彰。之後透過保甲組織強力推行、學校教育重建價值、女性自我意識覺醒，解纏足運動風行，漸漸除去她們的裹腳布，自此女足徹底解放。

纏足的存在與消失，不單純只是因為男性的關係，也與女性為了取悅男人，為了未來美好而主動參與。隨著解纏、天足風潮形成，不僅使女性奪回身體自主權，同時可以擺脫傳統束縛與限制，對內可協助家計生產，對外可成為職業婦女。隨著女性經濟、社會地位提升，有助於日後女性進一步爭取政治等方面的權利。

（二）國家同化的成功

清朝統治下的台灣，相較於當時時局的變化，無疑傳統又落後，因此當日本殖民者來台時，各方面顯得格格不入。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以現代化作為改革主軸，成為東亞最先進之大國，進而對外展開強勢的軍事和文化侵略。日本治台不僅追求現代化的革新，也追求同化的成功，改造不合時宜的女性自然成為總督府的重要任務，透過廢除纏足和興辦女學以達成其目標。放足運動的成功，代表日本帝國教化的成功，也可合理化殖民台灣的行為，證明日本統治可使台灣邁向文明社會。

二、建議

纏足風尚的流行有其歷史脈絡，不僅彰顯父權社會控制的慾望，也透露了女子本身美感的觀念及期盼嫁入理想的夫家願望，亦可成為國家統治的工具之一。因此，在研究纏足解放運動發展前，必須先對纏足背景有基本的了解，以免陷入單向思考的危險。相同的，纏足解放運動的推行，也必須從統治當局態度、社會風氣轉變、兩性思維改變等角度多向分析，才能較完整呈現纏足解放運動的過程。

今日文明社會，已無人再纏足，但「高跟鞋」是否代表著纏足重現呢？這又是另一討論的課題。

陸、參考文獻

一、專書

洪郁如（2022）。**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高彥頤（2022）。**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游鑑明（2022）。**日本殖民下的她們**。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二、期刊論文

林淑慧（2004）。〈日治時期臺灣婦女解纏足運動及其文化意義〉。**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10（2），76～93。

金湘斌（2011）。〈日治初期（1895-1906 年）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摸索與建立〉。師大臺灣史學報，4，161～201。

苗延威（2013）。〈從「天然足會」到「解纏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1，125～174。

簡鑫如、謝穎慧（2023）。〈客家女性與纏足—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資料之證據〉。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27，55～79。

三、報紙文章

社評（1908 年 12 月 17 日）。纏足之弊宜矯。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 版。

李氏寶（1915 年 4 月 14 日）論纏足之弊害及其救濟策。臺灣日日新報，6 版。

宜蘭解纏足會（1912 年 1 月 18 日）解纏臨時會。臺灣日日新報，5 版。

林知義（1915 年 4 月 12 日）論纏足之弊害及其救濟策。臺灣日日新報，4 版。

詹安（1915 年 4 月 16 日）論纏足之弊害及其救濟策。臺灣日日新報，6 版。

廖學枝（1915 年 1 月 01 日）論纏足弊害及其救濟策。臺灣日日新報，53 版。

雜報（1911 年 8 月 10 日）解纏會發會式展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 版。

四、網路相關資源

命運轉折：中央研究院—流轉年華臺灣女性檔案百年特展。2011，
https://herhistory.ith.sinica.edu.tw/Exhibit_fan.html

黃玉階〈天然足會旨趣〉：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0.7.16，
<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58/794>。